

中央党校主楼的历史

□ 谢煜桐



经过中央党校南门，可以看见学校院内不远处巍然屹立着一座七层雄伟庄严的大楼，这就是中央党校主楼。主楼是中央党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主要建筑之一，已成为中央党校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央党校的一个重要形象与标志。

1949年1月北平解放。3月，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从河北建屏县（今平山县）出发，迁往北平，10月，有了第一个正式的固定的校址——自得园，即现在中央党校南院，后来由于南院的条件不能满足大规模培训干部的需要，党校在建设南院、小北院、东院的同时，积极另选新址，建设新校舍。在1951年8月时，中央就同意马列学院在大有庄北，也就是今天的中央党校北院所在地修建新校舍，北京市政府也签发了公函表示同意。由于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仅进行了一些勘探工作，未能进行大规模建设。1955年8月1日，马列学院正式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1956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校舍建设总体规划及预算上报国务院，经（56）国直管习字第6号文件批准，总建筑面积为16万平方米。至此，北院校区正式动工兴建。

北京工业设计院根据党校

提出的要求制定了北院校区建设总体布置、设计要点和总平面初步设计方案。担任规划设计的总设计师是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戴念慈。校园设计的总体布局是围绕一条起自颐和园万寿山景福阁，自南向北长达1100多米的中轴线进行的。这条中轴线当年测定为子午线。党校的正门、主楼、大礼堂、原大白楼等重要建筑自南向北依次排列，其他建筑如后来建设的原图书馆、陈列馆及各学员楼左右对称。

在所有这些建筑中，主楼的分量很重。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主楼的建造。刘少奇曾指示要把主楼搞得更好一些。在主楼设计期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与中国建筑学会组织了高级专家就主楼的立面设计等问题专门进行研究论证。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亲自审阅、批准主楼的建筑造型和图纸。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刘仁看过主楼的图纸设计后，认为高级党校的办公主楼将是一个超时代的大楼。

主楼建筑采用钢筋水泥的砖混结构。1958年4月开工，1962年建成，竣工的时间镌刻在主楼东南侧底层墙面上，至今清晰可见。

主楼整体造型为狭长形，由教学楼、教研办公楼和行政办公楼三部分组成。一至四教室位于主楼东侧，以连廊与主楼连接，是当时的

主要教学活动场所。用过街楼把中部与东、西配楼衔接。两侧向北以连廊与原图书馆、陈列馆相接，高低分明，错落有致。

主楼屋顶为平顶，用琉璃檐子和额枋等作重点装饰。檐下的转角墙面镶嵌了四幅巨型大理石浮雕，突出了党校特色。主楼外墙为黄缸砖贴面，灰色花岗岩蘑菇石构筑基柱。主楼入口处的两侧，立有一对造型别致的石柱。

主楼当时有569间房屋，总建筑面积23636.20平方米，高31米，总长近300米。主楼中间行政办公楼为7层，东、西两翼配楼为4层。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党校停办，包括主楼在内的部分校舍被其他单位借用。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在中央领导的关心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陆续收回了主楼等校舍。此后，虽然中央党校根据新的形势需要，在不同时期增建了不少校舍，但是主楼一直承担着中央党校行政办公楼和教研办公楼的重要功能，和一代代党校人的青春岁月与奋斗记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2020年12月21日，中国博物馆协会公布了《关于第四批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名单的公告》，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次核定的520家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中，隶属于区县级以下的博物馆就有316家，涵盖国有博物馆240家，非国有博物馆76家。在240家国有博物馆中，有一级博物馆17家、二级博物馆99家、三级博物馆124家。本次评估新增的区县属国有定级博物馆总数，相当于前三轮博物馆定级评估中通过的区县属博物馆数量之和；新增的区县属国有一级博物馆数量，超过原有数量的4倍，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基层博物馆质量水平的大幅提升，以及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逐步落实。

博物馆在现今的中国，对于每一位国人，尤其是城市居民来说，基本上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博物馆参观古建筑，带孩子去博物馆看文物展览，茶余饭后聊展品几乎成为生活的常态。此次公布的316家县区等级博物馆，数量如此之多，分布如此之广，质量提升如此之快，也有力地说明了基层博物馆对于服务基层的重要性。

博物馆在地方文化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同时，谨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以少走弯路、更好前进。”博物馆是地方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它是展示地方文化的城市名片。博物馆承载着一个地方丰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彰显了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文化魅力。其次，它是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博物馆馆藏的文物，通常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对于传承地方文化、宣传地方历史、弘扬爱国主义教育，都是一个良好的宣教基地。再次，它是保管、修复、研究、展示文物的科研基地。无论是专门性博物馆、纪念性博物馆，还是综合性博物馆，其现代化建设正在向具备搜集、保存、修护、研究、展览、教育、娱乐等众多功能的方向努力。促进地方文化发展，加强基层博物馆是一个重要方面。推进基层博物馆建设，就要提升其内涵、强化其功能，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使其更好地发挥服务基层、传承文化的作用。

提升内涵，讲好地方故事。博物馆的外在呈现，表现为一座城市的名片，而实际上它更多的是承载了本地人民对祖先的崇敬、对生活的热爱和民俗的延续，是情感寄托和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建设好基层博物馆，必

须充分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文物等方面特色资源，结合行业政策与地域发展实际，切实提升县级博物馆的硬件设施与内涵水平。地方名人故居、红色革命文物、非遗类、古建筑类、民俗类、文创类、自然资源类、地方志修订、重大历史事件纪念等方面的文物，都可以是基层博物馆的建设特色或者陈列侧重。基层博物馆对于传承地方文化根脉，保护地域文化资源，展示地方形象，讲好地方故事，都具有重要意义。

强化展览，扩大社会影响。基层博物馆应在原有社科教育活动基础上，组织特色馆藏文物展览、中小学生学习研学旅游活动、红色革命英烈事迹介绍、地方历史文化知识讲座等系列活动，此外，还应该持续提升陈列布展水平、打造博物馆志愿者讲解团队、制定文创产品的研发，不断拓宽博物馆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要将博物馆的对外开放交流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以不断扩大社会大众对于博物馆活动的关注与利用，提升博物馆在基层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力。

吸收人才，补齐科研短板。基层博物馆应该加大在文物保护、科研设备、人才引进、培养提升等方面的投入。基层博物馆除了馆址建设与文物库房建设、安全保卫系统要合乎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外，还应该设置独立的文保科研部门、健全文物修复实验室、建设馆藏文物现代管理系统、完善馆藏文物的数据信息中心，并尽可能地启动珍贵可移动文物的预防性保护项目。同时要与人事部门配合，按需求招募历史、考古、文博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使得基层博物馆逐步提高科研能力。文物保护，基础在县，只有县级的博物馆具备了一定的科学研究、保护修缮、陈列布展、科教宣讲等方面能力，文物保护的基层基础才能筑牢，文物保护事业才能获得长远发展。

当前全国都兴起了文物热与博物馆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传统文化正在蓬勃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



更好发挥基层博物馆文化传承功能

□ 石磊

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数量众多的基层博物馆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当代文化精神、创新人文展示利用方式方面，发挥的作用无可替代。广大基层文博工作者，也应该趁着文旅融合的东风，肩负起“不辱使命、守土尽责”的担当精神，努力提升基层博物馆的质量与内涵，为基层百姓父老提供更好的服务水平，进而更好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五日登州府 千年苏公祠

□ 孙钦军



蓬莱海市公园里的苏轼雕像



蓬莱阁

宋元丰八年（1085年），谪居黄州5年多的苏轼踏上了北去边关重镇登州府的漫长旅途。十月十五日，苏轼抵达位于蓬莱的登州府衙，然而仅仅在担任登州知府5天之后，他又接到朝廷诏命，令其再次启程赶赴京城担任礼部郎中。

登州自古是北方重要的海防要塞，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是兵家必争之地。唐朝初年即在文登设置登州，不久予以废除，如意元年（692年），朝廷又于黄县复置登州。到了宋朝，登州辖蓬莱、黄县、牟平和文登等地，府衙则设在蓬莱。

元丰八年的蓬莱阁刚刚建成24年，默默耸立在丹崖山上，在这个远离汴京的海边尚名不见经传。刚刚历经人生磨难的苏轼来到蓬莱阁，在渤海之滨，望着浩瀚壮阔的海面，难抑激动的心情，挥笔写就《蓬莱阁记所见》：“登州蓬莱阁上，望海如镜面，与天相际。忽有如黑豆数点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阁下。”然而不几日内，朝廷诏命旋即而至，苏轼心中怀着些许遗憾，在离别之际又题写了《海市诗》：余闻登州海市旧矣。父老云：“常见于春夏，今岁晚不复出也。”余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见为恨，祷于海神广德王之祠，明日见焉，乃作是诗。

东方云海空复空，
群仙出没空明中。

荡摇浮世生万象，
岂有贝阙藏珠宫。
心知所见皆幻影，
敢以耳目烦神工。
岁寒水冷天地闭，
为我起蛰鞭鱼龙。
……

苏轼的诗词为蓬莱阁注入了灵气和精神，犹如画龙点睛，让这座寂寞矗立在海岸的亭阁从此声名赫赫。

如今来到蓬莱阁，在飞檐翘角的建筑群中依然可以找到苏公祠和卧碑亭，“五日登州府 千年苏公祠”也成为当地引以为傲的美谈。苏公祠里近年来供奉着苏轼的画像，见证了苏轼短暂时间担任登州知府后深受百姓爱戴的历史。

苏轼是才情满怀的诗人，海岸的壮阔景象让他的心胸更加宽广，在经历了艰难的谪贬生活之后，他依然保持一颗纯粹的赤子之心，在这个偏远的边关重镇上，他想到的仍然是为黎民苍生计，造福当地百姓。

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苏轼在登州知府任上仅仅5个日夜，他在卸任后，又驻留了10余日。在这段短暂的日子里，苏轼尽自己所能体察民情，掌握了一些关系民生的紧要事务。当他离开后还继续为登州老百姓做了一些实事。史载，元丰八年十二月，苏轼刚刚离开登州回到京城，便上奏朝廷《乞罢登莱榷盐状》和《登州召还议水军

状》，为民请命，为国固边。

这两篇奏章，行文如流水，言简意赅，堪称调查研究的“范本”。苏轼写的《乞罢登莱榷盐状》，文风朴实，直面问题，对策精准，分析了榷盐制度的弊病，提出了改进措施。登州沿海历来是重要的产盐之地，他却看到灶户失业，百姓吃不起盐，官府里的盐堆积如山，而商贾不至。清代盐政碑记中记载：“苏文忠公，莅任五日即上榷盐书，为民图休息，士人至今祀之，盖非以文章祀，实以治绩也。”《蓬莱县志》亦记道：“蓬邑不食官盐，自宋代苏长公已条奏得免其累，洵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同月，苏轼又向朝廷呈上《登州召还议水军状》：“右臣窃见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作为海防重镇，登州北部接近辽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本应严防戍守，他却看到此地守卫松懈，驻防随意抽调。在详细考察这里的边防要塞情况之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北宋太平盛世外表下潜伏的巨大危机，朝廷也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加强蓬莱沿海防务，在蓬莱阁下建成了刀鱼寨。

在他离开登州之后，当地老百姓立起很多苏公碑，上面密密麻麻地刻着他写的《乞罢登莱榷盐状》，在这块土地上，他的诗词和奏章成为代代传诵的锦绣华章。

回到汴京的苏轼又经历了数次谪贬，辗转多地。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在正月里驾崩，宋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苏轼结束了3年的海南岛流放生涯，移廉州安置。十一月在行至英州时又接到朝廷诏命：官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第二年，苏轼度岭北归，行至真州时再度游览金山寺。长老向他展示了画家李公麟特意为他精心画的肖像，他抚画感慨万分。30年前36岁的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初游金山寺，指点如画江山，意气风发：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如今历经谪贬磨难，已是白发苍苍，苏轼回顾坎坷的人生历程，挥笔题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或许，生性豁达的苏轼已经将西湖疏浚、徐州抗洪和登州两奏章等那些实实在在的功业都淡忘了，都当作是他宦海生涯的分内之事。

1101年7月，苏轼终老于常州颍塘桥畔，当地百姓恸哭于市。苏轼逝世920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再次细读苏轼的《乞罢登莱榷盐状》和《登州召还议水军状》，遥想他登州知府任上5天劳碌的身影，感受他字里行间浓厚的家国情怀，仍然会为之敬佩和感叹。在蓬莱阁上，后世曾有人赋诗曰“诗卷从来已折衷，古祠今又拜遗风，果然日与山海对，公爱此间我爱公”。如此关心民生疾苦的好官，如此胸怀旷达、才情满腹的诗人，老百姓又怎会不爱戴他呢！

